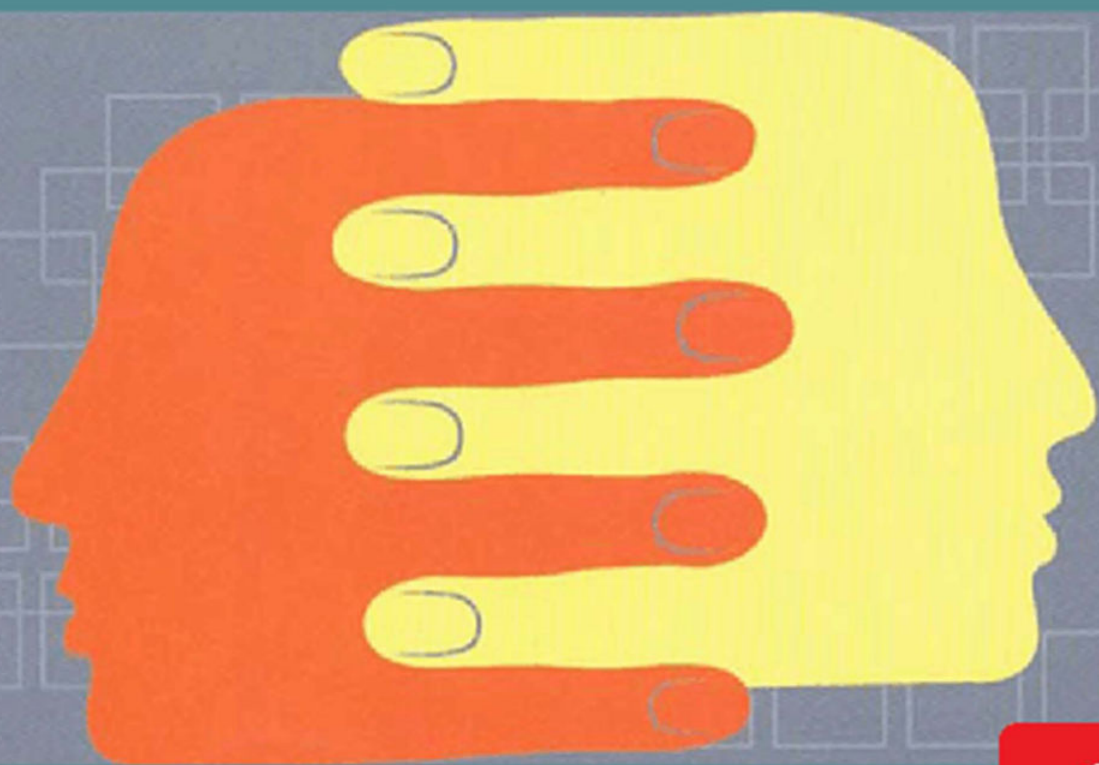


西安道教百年

刘康乐



三秦出版社



总序一

胡诚林

古城西安地处中国大陆腹地黄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北带渭水，南抱终南，东邻华岳，西连太白。浩浩黄河水，巍巍终南山，加之一马平川的荡荡关中平原，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驰名中外的灿烂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蓝田人开启了人类文明光辉的一页，半坡遗址讲述着中华先民勤劳智慧与生生不息的传奇。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先后在此建都，不断将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推上中华文明的新巅峰。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千百年来，古都西安悠久的历史与厚重的文化底蕴不仅折射出璀璨的华夏文明，也为独特丰富的道教文化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丰富养分。西安道教文化积淀很深，影响久远。2500年前，太上出函谷于楼观说经讲道，留下传颂千古的《道德》五千言，奠定了中华道教的千秋基业；大唐盛世，立道于三教之首，此时长安仙宫道观林立，终南修道蔚然成风；金元以降，王重阳祖师遇仙于甘河，法筵广开，开创了道教全真派，使之成为后世道教最具影响的重要道派。“天下修道，终南为冠”，充分说明西安在陕西乃至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全面落实，宗教活动逐渐恢复，西安道教得以快速发展。30年前，西安仅有楼观台、八仙宫两处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历经30年的努力，西安现有正式开放的道教宫观33处，这些宫观，大多历史悠久，底蕴厚重，建筑宏伟，管理规范，香火鼎盛，影响深远，是古城西安古风古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内外各界人士感受人文西安、魅力西安的重要窗口。

我们说中华复兴，文化先行。书以载道，文以化人。因此，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彰显道教的时代内涵，使之更好地融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服务于大众精神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既是新时代的新要求，也是推动道教创新发展、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传承、保护和弘扬西安道教文化，西安市道教协会组织开展了“西安道教文化丛书”的编纂工作。这既是一部走近西安人文、展现古城文明的有力杰作，也是一项通过系列道教文化著作，很好地梳理西安道教历史脉络与发展历程，推介西安宫观特色和思想价值，展现西安道教在爱国爱教、继承传统、弘扬文化、管理创新、对外交流、倾心慈善等方面取得良好成就的重要举措。相信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套丛书，能较为系统地了解西安道教的历史和现状，体味道教博大精深的思想精髓，进而更好地和历史对话，向圣人学习，与智慧同在！

2017年11月
于西安万寿八仙宫

总序二

刘世天

长安福地，终南仙山，八百里秦川钟灵毓秀，炎黄子孙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这一方土地上的辉煌历史，孕育了深邃智慧的道教文化。关中形胜，万年长安，昔女娲圣母在骊山炼石补天、抔土造人，而老母圣殿，已享祀千年。西周末年，老子入关西游，应函谷关令尹喜之请，说经楼观，留下《道德》五千余言。东汉之末，天师道兴起于巴蜀汉中，而三辅有骆曜之緇匿道，亦为当时三大道团之一。大唐立国，尊道教为国教，追宗柱下，定道在三教之先，而楼观道之“田谷十老”，通道观之贤才大德，皆汇聚京城，论道畅玄，斯时长安终南修道蔚然成风。

两千多年来，终南长安为道教文化之重镇，高道辈出，宫观林立，是众多道教教派的祖庭，见证了中国道教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着中国道教的兴衰沉浮。终南源自昆仑仙山，自古就是神仙洞府、上真福地，太乙天都、终南玄都，为古代皇家祭祀之圣地。北周通道观、隋朝玄都观、唐代崇玄馆，都书写着古都长安道教历史的辉煌篇章。唐末五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但古都长安作为道教的发祥地，继续传承着中国道教发展之慧命。唐末五代钟离权与吕洞宾师徒，开创了钟吕金丹大道；宋金之际，重阳祖师终南遇仙，传承金丹仙脉，融通三教，独步全真，开宗立派；七真继承遗志，开创了中国道教的新局面，全真教由此成为中国道教最有影响的宗派之一。

“天下修道，终南为冠”，以终南山为中心的关中大地，是中国道教文化的中心地带，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道教文化遗产。长安子午谷玄都坛是西汉时期留存至今的仙道遗迹，对于研究汉代皇家道教祭祀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北朝时期，民间造像极为兴盛，西安碑林、临潼博物馆保存的北朝道教造像，是研究北

朝道教历史重要的文物史料。唐代以道教为国教，都城长安是全国道教文化的中心，唐玄宗时代雕刻的老子玉像保存至今，是不可多得道教文化艺术珍品，其他如景云钟、回元观钟楼铭以及数量众多的唐代道士墓志铭，都显示了大唐道教艺术之精湛和长安道教事业之繁盛。在音乐上，全真正韵、关中道情和西安鼓乐当为中国道教音乐的艺术瑰宝，皆源自唐代宫廷道曲，有着重要的艺术价值。

西安的道教以良好的修行传统享誉全国。近代的一百年来，是中国道教从衰微走向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楼观台、八仙宫作为全国著名的十方丛林，多次开坛传戒，延续龙门律宗法脉，重阳宫、东岳庙、吕祖庙、都城隍庙、会真庵、清华宫、三元宫、碧天洞、丹阳观等众多的道教宫观名扬天下，乔清心、安来绪、王理仙等高道辈出，载誉道林。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新气象和反“右派”运动以及“文革”期间的冲击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道教事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87年12月西安市道教协会正式成立，掀开了古城西安道教事业的新篇章。三十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委统战部、市宗教局的关心支持下，在全市道教界的共同努力下，在闵智亭大师、任法融大师等道门前辈的带领下，西安道教事业蒸蒸日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而西安道教界之道风纯正，宗教活动规范有序，为全国所瞩目，闵智亭、任法融等玄门大德，学养高深，仪范长存，道门称颂。

三十年来，西安道教界延续千年来的修学传统，宗教实修和学术研究并重，为当代道教界做出了模范和表率。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安道教学术界积极开展道教研究工作，出版了一系列深有影响的道教著作，举办了一次次道门盛会和玄门讲经活动，展现了西安道教界的学术风范。在闵智亭、任法融、樊光春、张应超等老一辈道教学者的带动和指导下，一大批青年道教学者正在成长起来，十几位道教学博士汇聚西安，他们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更多的研究内容值得深入，因此“西安道教文化丛书”的编写，就提到了日程上来。

西安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是当代“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古城西安见证着中华文化东西交融的历史，也承担着中华文化复兴和传播的历史重任。道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中国文化的根柢，道教的宇宙哲学、生态智慧、道德伦理、艺术成就，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给予我们指导和启迪。

西安有着丰富的道教文化资源，更有着优良的修学传统，“西安道教文化丛书”将以西安道教为研究重心，组织道教学者编写一系列的著作，主要包括西安道教的历史、宫观山志、仙真传记、教派思想、艺术文化等，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西安道教的研究，更期待着饱含智慧的道教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给予我们智慧的力量，增强中华文化之自信，创造更大的辉煌！

2017年10月
于西安都城隍庙

序

樊光春

刘康乐博士主编的《西安道教百年》一书即将正式出版了，我向刘康乐博士的研究团队表示衷心的祝贺。本书作为“西安道教文化丛书”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西安道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历史性时刻与诸位读者见面，代表了当代西安道教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西安道教近一百年来事业的沉浮和当代振兴的曲折历史，尤其见证了当代西安道教界同仁在道教协会成立三十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我在表达祝贺的同时，也想就相关问题谈一些自己的感想。

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鼓励和推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柱的儒道释三教的研究。三教文化曾经在历史上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近代以来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曾经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三教文化更是被当做封建迷信和落后文化被淡化或贬低，以至于今天的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非常浅薄。可喜的是，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国人也逐渐认识到儒道释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尤其对于建立中国自己的人文话语体系意义极其重大，从而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西安道教百年》的出版，就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今年是西安市道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又欣逢“第二届道教文化艺术周”盛典在西安举办，西安道教的影响力日益显著。古城长安有着优良的道教学术传统，通道观、玄都观和崇玄馆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道教研究机构，起源于长安地区的钟吕金丹派以及全真教，也是学术性很强的道教宗派。近三十年来，西安道教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以“西安道教”为对象的专门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尤其是对民国时期的西安道教历史研究，更是薄弱环节，因此，《西安道教百年》的出

版，也显示了它的开拓性和独创性。

西安有着丰厚的道教文化资源。终南山是中国第一福地洞天，历代高真辈出；古城长安，仙韵玄都，是道教发展的重镇；骊山是女娲补天的神山，楼观是老子说经的旧地，重阳宫是全真教的祖庭，八仙宫是近代西北第一全真丛林，都城隍庙是天下三大都城隍之一。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长安和终南山在道教历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三十年来，西安道教界走出了1949年以来国内的第一位传戒大律师王理仙方丈、两位中国道教协会的会长闵智亭道长和任法融道长，为当代道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安道教界同仁更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将古老的道教文化传播到海外，影响深远。西安市道教协会自1987年12月创立，已经走过了三十个春秋，当年创会的王理仙大师和闵智亭大师也已经羽化多年，我们深切怀念和感恩道门前辈们所作的开拓之功，也更加珍惜时代赋予道教事业发展的良机，坚守道业，不断精进，弘扬道教智慧，造福人类社会。

刘康乐博士的研究团队是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是我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过来的，近年来致力于陕西道教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他们通力合作，历经艰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项研究，殊为不易。近年来他们还积极参与西安道教学术活动的策划和承办、道教专著的编写和道教期刊的编辑等工作，成果丰硕。借《西安道教百年》出版之际，我向他们表示祝贺，也期待着他们在今后做出更多的优秀研究成果！

2017年10月

于长安崇业坊

CONTENES 目 录

总序一	胡诚林/1
总序二	刘世天/3
序	樊光春/6

上 编 道 业 百 年

第一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安道教

第一节 革命浪潮与道教沉浮	3
第二节 城乡宫观与道教胜迹	7
第三节 道教庙会与城乡社会	23

第二章 1949年至1986年的西安道教事业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安道教的新气象	26
第二节 反“右派”运动和“文革”对道教的冲击	30
第三节 宗教政策恢复后的道教发展	34

第三章 三十年来的西安道教发展

第一节 西安道教的新组织	37
第二节 道教事业的新发展	45
第三节 道教研究的新成就	87



下编 仙韵长安

第四章 百年玄门师范	
第一节 近世仙范	107
第二节 当代高真	118
第三节 档案存真	141
第五章 西安道教宫观	
第一节 开放道教宫观	149
第二节 历史宫观遗存	183
第六章 西安道教文化	
第一节 道教造像	186
第二节 道教金石	199
第三节 道教古籍	221
第四节 道教绘画	227
第五节 道教音乐	230
附 录	
西安道教百年(1913—2017)大事记	234
后 记	251



上编 道业百年



第一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安道教

第一节 革命浪潮与道教沉浮

清末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的“庙产兴学”运动，给传统的佛教和道教带来很大的冲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几近衰微的道教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道教界首倡发起成立道教组织，以维护道教的庙产等权益。民国元年（1912），由北京白云观住持陈明霖等18名道教全真派代表，于北京发起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随后各省也相继纷纷成立道教分会。1913年陕西省道教总分会^①在西安八仙宫成立，八仙宫方丈封圆智被选为会长，西安都城隍庙住持姚春发道长被选为副会长。

陕西省道教总分会成立后，为应对清末以来“庙产兴学”潮流中对道教庙产的肆意侵占和破坏，会长封圆智与副会长姚春发励精图治，积极筹划开展教育、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以维护庙产之权益，呈请教育司“开办蒙养识字学校、古琴学校、贫民教育所、农桑教育试验场等，并扩大慈善医院以宏善举、设立道教研究所以阐教化。”^② 1917年，西安东门里东岳庙顺应庙产兴学的潮流，在后殿开办一所私塾，1931年改为



秦省道教总分会图记

^① 民国时期，全国及各省先后都成立了各种道教组织，但大都如过眼云烟，道教界一盘散沙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② 见《秦中公报》1913年2月5日第266号教育司批文。



道德小学，1937年改制为完小，然苦于“设备简陋，徒具虚名而已”^①。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寺观多毁于兵火之灾，而佛、道教整体呈现比较衰败的景象，1924年夏，王桐龄、鲁迅等人来西北大学讲学，在《陕西旅行记》一书中这样描述对西安宗教之印象：“僧尼喇嘛寺、道观，虽随处皆有，但除去最少数之高僧外，多系解决面包问题，不以研究宗教为目的。”^② 据1933年凤翔县长呈文称：“自辛亥革命以来，所有城关寺庙迭被兵匪占据，屡经拆毁殆尽。乡间寺庙，土匪时行抢劫，僧道逃避一空。墙垣倾圮，门窗被盗无余，房屋亦被盗拆。”^③

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东北、西北、西南各地仍为军阀所占据，军阀之间常年混战，对宗教无暇以顾。国民政府虽然出台了不止宗教管理政策，但大部分都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贯彻实施，^④ 而地方政府、军队强占寺庙之事时有发生，如华阴西岳庙、王曲城隍庙等处道士被驱逐出庙，殿宇遂为军队所征用占据，即如八仙宫这样的丛林，也不免常有驻军侵扰。

1932年3月5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1932年6月13日，“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建设陕西西安为现代化的城市为目的，企划将中国首都迁移西安，此后围绕西京的现代化建设由此开展，古老的西安也迎来了历史发展的重大契机，西京的佛道教寺观文物考察和保护也被列入政府的工作之中。

① 王荫樵编：《西京游览指南》，天津大公报西安分馆印行，1936年，第178页。

② 王桐龄著：《陕西旅行记》，北京文化学社，1928年，第33页。

③ 陕西省档案馆存，1933年。

④ 民国政府为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制定了新的宗教管理政策，对佛教和道教加强管理和监督。1915年，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名义颁布了《寺庙管理条例》以便管理宗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破除迷信、庙产兴学引发的毁寺庙、焚经书之风，愈演愈烈，各处寺庙因产权关系时起纠纷，地方政府处理此种纠纷时，亦无适当法令遵循，因此政教双方均纷纷呈请另颁《寺庙管理条例》。1928年11月民国政府公布了《神祠存废标准》，废除了道教中的日月水火、五岳四渎、龙王、文昌、城隍、送子娘娘、财神、瘟神等诸神祠及画符念咒等宗教活动，民间的道教祠庙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1928年12月，《寺庙管理条例》仓促出台，但带有明显的“党治”色彩，引起佛道教界的不满和庙产纠纷的增多，1929年11月，立法院第63次会议逐条讨论通过《监督寺庙条例》，明令废止了《寺庙管理条例》。

西京古迹名胜略图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西北大學地理系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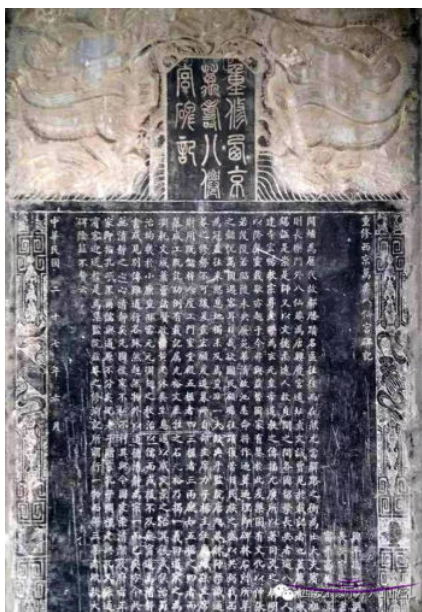
1932年西京筹备委员会所绘西京古迹名胜略图



1934年主政西安的杨虎城将军、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孙蔚如等军政界要员，注重保护古都历史文物，曾经出于保存“固有文化，以声张民气”的目的，带头捐资修复西安宫观文物，对西安八仙宫进行了规模较大的修建工作并立碑记事。据1938年冯光裕在《重修西京万寿八仙宫碑记》说：“方今共和初政，百度建设。不能为清静之治，不可无清静之心。心清静矣，先国后家，不私不利，其与今国家崇清洁政府旨正合也。”^①反映了当时有识之士希望吸取道家思想以实现善政之美好愿望。

全国统一之后，国民政府致力于国家建设，开发大西北也成为政府施政的要务，1935年1月，随着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段建成通车，给落后的西安带来了更多现代化的气息，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旅游和考察活动也成为一时风潮，西安道教界也感受到新时代革命带来的莫大的冲击和洗礼，民国以来新的社会思潮也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在当时全民抗战的热情下，西安道教界支援抗战，立下汗马之功。由于保存中华文化的需要，抗战中许多文化教育单位西迁西安，1937年8月由内迁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



1938年所立的重修西京万寿八仙宫碑



化羊庙藏秀亭陕西省立鄠县师范学校旧址碑

^① 张建新、陈月琴编著：《西安八仙宫》，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

三校图书馆合组而成的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总馆大学本部就设在西安都城隍庙内^①。1939年，为避敌机轰炸，陕西省立西安师范与女子师范学校迁至鄠县化羊庙，合并为陕西省立鄠县师范学校继续办学。

抗战中，西安东岳庙免费提供前殿作为缝制军衣的西安妇女合作社，1941年1月12日，时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的王子云携夫人何正璜参观西安东门东岳庙之壁画，记载说“抵东岳庙前，今为女工等缝制军衣之所”^②。1941年，陕甘宁边区道教界在八仙宫成立了西安道教会，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事业，八仙宫的郭静阳、



20世纪40年代王子云、何正璜夫妇在西安

周秋阳两位道长还曾经利用八仙宫掩护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刘子衡先生和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的革命活动，以自己的善念与胆识为抗日、反内战做出了重要贡献，为西安道教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③。1942年日军飞机轰炸西安城，都城隍庙殿宇为炮弹所毁，庙内珍藏的明清鼓乐乐谱也付之一炬，日军的行径更加激发了广大道众对抗战的热情，纷纷筹资捐款，助力抗战。

第二节 城乡宫观与道教胜迹

民国时期西安城乡各县道教庙宇虽极多，然多为乡民、僧尼或其他社会人员所占用，而出家道士的人数，在各宗教中也是较少的。据1935年中国国民党陇海铁路特别支部所编的《陇海铁路调查报告》称：“本路沿线人民之迷信，以信神佛为最多。沿路各地大小庙宇无处无之，甚至于大树、小蛇、田间巨石、狐

① 何日章：《西北联大图书馆概况》，《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3卷第2期。

② 何正璜：《西北考察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第39页。

③ 潘存娟：《全真丛林八仙宫》，华夏出版社，2013年，第92页。